

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苹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蔡荣 韩洪云*

摘要：鉴于合作社集体产权安排和成员股权无法转让等原因，当存在影响社员利益分享或成本分担的组织决策且上下级信息沟通渠道顺畅时，利益相关者就会试图扭曲组织决策以获取潜在收益，进而产生降低决策效率的“影响成本”。本文利用山东省苹果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首先测度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规模，然后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社员异质性是导致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增加的关键性因素；管理者存在外部选择诱惑、采用“一人一票”制表决方式和合作社扩张社员规模等对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此，协调异质性社员的利益诉求、选择合适的组织决策模式和设计合理的管理者激励制度对于转型经济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成员异质性 合作社 影响成本 组织结构

一、引言

“影响成本”(influence costs)概念源于公共经济学，是指利益相关者通过贿赂或勾结以扭曲政府决策进而获取额外收益所花费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末，影响成本被引入组织经济学，研究重点是如何设计出合理的薪酬制度和晋升政策来降低组织内部影响成本(Milgrom, 1988)。研究表明，当组织内部存在影响利益分享或成本分担的潜在决策且信息沟通渠道顺畅时，就容易产生影响成本(Milgrom and Roberts, 1992)。鉴于集体产权安排、社员股份无法转让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约束机制缺乏等原因，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问题正成为组织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践中，由于普通社员参与合作社经营和管理的能力相对不足，民主控制不得不演变为管理者控制，从而产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状态下的委托-代理问题(Hansmann, 1996)。具体而言，社员免费搭便车、投资短视、投资组合失灵和集体控制机制是造成合作社经营低效率的根本所在(Cook, 1995)，而影响成本则是导致农业合作社集体决策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Bogetoft and Olesen 2003; Iliopoulos and Hendrikse 2008)。

截至2009年12月底，全国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24.64万家，实际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孙鲁威, 2010)。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从领办主体的身份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业企业等少数“带头人”在获利机会驱使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林坚、黄胜忠, 2007)。降低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不仅是转型经济背景下提高合作社运行效率和实现合作社合作原则的要求，也是农业和农村实现共同发展目标的关键(马彦丽, 2007)。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利用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及其决定因素，

* 蔡荣，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29，电子信箱：xiaopg918@126.com；韩洪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29，电子信箱：hongyunhan@zju.edu.cn。

本文得到2008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农村水环境管理机制设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农业水资源与环境管理及其政策研究”(2007JJD63001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资源环境税收政策研究”(09AZD04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这对于合作社集体决策效率改进和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包括影响成本测度、影响成本决定因素和简要评述等内容;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实证模型,并就相关变量的测度进行说明;第四部分交代数据来源,分析模型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影响成本的测度

影响成本本质上属于组织内的交易成本。从决策的制定角度而言,影响成本包括决策的任意授权成本(costs of discretionary authority)、成员隐匿或扭曲信息导致的次优决策成本(costs of suboptimal decisions)和组织内部采取措施控制影响活动的效率损失成本(costs of lost efficiency)(Milgrom and Roberts, 1990; 安慧, 2010)。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影响成本的测度指标具体可以包括:利益相关者制造或遏制影响活动的时间机会成本、对产生准租金的决策的监督和执行成本、与延误决策有关的协调和计量成本、错误决策或无决策成本、为避免影响成本发生所采取措施的设计和 implement 成本(Iliopoulos and Cook, 1999; Iliopoulos, 2007)。显然,这些指标在具体测度时缺乏操作上的可行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Iliopoulos 和 Cook(1999)认为,可以采用“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成员间出现严重分歧的频度”、“管理者处理影响活动的时间消耗”、“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和“社员之间是否存在互助式投票(logrolling)”等指标来测度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

(二)关于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

从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决定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因素大致包括社员异质性、组织内部结构和管理者因素等,具体来讲:

1. 社员异质性。Hansmann(1996)认为,社员异质性是引致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及影响成本的关键性因素。一方面,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受损社员选择私自或联合起来组建临时小组,充分利用合作社内部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向管理层施压试图影响决策结果,一旦影响活动失败,利益受损社员还有可能“用脚投票”,退出合作社;另一方面,潜在的或实际的利益受益社员也可能选择制造影响活动,例如通过贿赂管理层以避免有利于自身的决策被重新调整,进而谋求潜在的收益。Iliopoulos 和 Cook(1999)利用美国排名前 100 位农业合作社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成员异质性是影响成本的关键性决定因素;Gripsrud、Lenvik 和 Olsen(2000)通过对挪威农业合作社的研究也证实了社员异质性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也即成员惠顾数量的差异越大,影响成本将相应增加。

2. 组织内部结构。影响决策结果的动机常常内生于组织内部,Milgrom 和 Roberts(1990)认为,组织内部结构是决定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股权转让和交易的限制,以及缺乏资本市场对股权进行合理的估价,传统合作社内部产权存在模糊的问题(Cook, 1995)。在实践中,传统合作社内部只有惠顾者才拥有投票权,并且实行“一人一票”制,但是,随着外部投资者进入合作社,这些利益相关者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参与合作社内部重要事务的决策。因此,严格坚持“一人一票”制不仅会引起多数普通社员对少数核心社员利益的侵蚀,也会增加全体社员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Royer, 1992)。考虑到不同社员与合作社进行交易的差异性,如果所采用的利益分配制度能够兼顾不同类型成员的剩余索取权利,这将有助于缓解合作社内部利益冲突和利益分配难度,进而激励不同类型成员进入合作社进行交易或投资的积极性(Iliopoulos and Hendrikse, 2008)。

3. 管理者因素。在组织内部,通常管理者需要扮演多重角色,例如人际关系协调、重要信息传递、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等角色(Mintzberg, 1971)。与投资者所有企业相比,由于合作社的集体产权特征,管理者的领导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Cook, 1994)。组织内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越强,意味着管理者在进行各项决策时具备越强的利益平衡能力,从而能够遏制成员制造影响活动的可能性和控制与决策有关的潜在租金规模(Milgrom and Roberts, 1990)。而且,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outside option)可能也会影响到组织内部成员影响决策结果的活动数量(Appelbaum and Katz, 1987)。在存在外部选择诱惑的情况下,管理者致力于组织发展的积极性将减弱。研究认为,薪酬体系和晋升政策可以使雇员更公正地评价组织政策,从而降低对政策变化的抵制和减少组织内的影响活动(Milgrom, 1988; 胥胤, 2006);而且,适宜的薪酬安排还有助于降低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激励其设计卓有成效的政策方案,努力控制和减少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数量及成本(Iliopoulos and Hendrikse, 2008; Iliopoulos, 2007)。

(三) 简要评述

综观已有文献,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目前关于组织内部影响成本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而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则较为缺乏。本文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首先测度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然后实证分析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决定因素。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以往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也是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创租理论进行定量评价的一个尝试。

三、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一) 模型选择

当因变量是一系列离散值的时候,根据取值之间有无等级关系,可以分为有序和无序两种类型。对于有序的离散值的因变量在计量时需要通过有序概率模型来处理。由于本研究中的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测度是基于有序分类值加总基础上的离散型数据,因而选择了有序概率模型进行计量模型检验,有序 Probit 模型如下:

$$Y_i = \beta_i X_i + \mu_i \quad (i = 1, 2, \dots, n)$$

在此, Y_i 为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 X_i 为解释向量,包括社员异质性程度、组织内部结构以及管理者因素和控制变量; β_i 为待估计参数向量; μ_i 为随机误差项。尽管 Y_i 变量无法观测到,但它会落在 m 个序列组当中的某一类组。当 Y_i 属于第 j 类组时,则:

$$\alpha_{j-1} < Y_i < \alpha_j \quad (j = 1, 2, \dots, m)$$

上式中 α 定义为常数的集合 $\alpha_1 = -\infty, \alpha_m = +\infty$, 且 $\alpha_1 < \alpha_2 < \dots < \alpha_m$ 。由于 Y_i 只能被序列式观察到,因此,假设 $E(\mu_i) = 0, \text{Var}(\mu_i) = 1$ 。由于 Y_i 为一序列变量,定义:

$Z_{ij} = 1$ 如果 Y_i 落在第 j 类组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Z_{ij} = 0$ 如果 Y_i 没有落在第 j 类组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那么,可以得到表达式:

$$\text{Prob}(Z_{ij} = 1) = \Phi(\alpha_j - \beta_i X_i) - \Phi(\alpha_{j-1} - \beta_i X_i)$$

其中, Φ 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似然函数方程(likelihood function)为:

$$L = \prod_{i=1}^n [\Phi(\alpha_j - \beta_i X_i) - \Phi(\alpha_{j-1} - \beta_i X_i)]^{Z_{ij}}$$

通过进一步转换,得到对数似然函数(log-likelihood function):

$$L^* = \text{Log}(L) = \sum_{i=1}^n \sum_{j=1}^m Z_{ij} \text{Log} [\Phi(\alpha_j - \beta_i X_i) - \Phi(\alpha_{j-1} - \beta_i X_i)]$$

令一阶条件满足: $\frac{\partial L^*}{\partial \beta_i} = 0, \frac{\partial L^*}{\partial \alpha_j} = 0$ 。在二阶条件可以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即可求得参数 β_i 的估计值。

(二) 变量设定

影响成本的测度是本文的基础和难点。本文在 Iliopoulos 和 Cook(1999) 设计的影响成本测度指标基础上作了适当调整。笔者认为“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和“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与其被理解为影响成本的表现形式,毋宁说是决定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因素,而且考虑到“是否存在互助式投票的现象”属于社员之间的隐匿或默示行为,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观察和证实。因此,本文舍弃了 Iliopoulos 和 Cook(1999) 设计的“产品质量评级是否采用第三方鉴定”、“合作社未分配利润留存比例”和“社员之间是否存在互助式投票的现象”三项指标,只保留了其中的“社员间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频度”和“处理影响活动的工作时间消耗”两项指标;此外,根据以往的其他研究成果,本文另增加一项指标,即“成员试图影响管理层决策结果的频度”来测度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

在模型分析之前,首先对影响成本的各项指标进行赋值,当选项为①时赋值为1,选项为②时赋值为2,选项为③时赋值为3,选项为④时赋值为4。影响成本指标体系的内在信度评价表明调查问卷的可信程度较高,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将上述三项评价指标得分加总并分为由低到高的10个层级:总值为3为第1个层级,总值为4为第2个层级,……,总值为12为第10个层级。层级越高,表示合作社内部的影响成本越大。

社员异质性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资源禀赋、风险态度和股权比例等的差异。在社员异质性的度量上, Iliopoulos 和 Cook(1999) 采取的方法是由合作社管理层对社员异质性的各个层面进行主观评价, Gripsrud、Lenvik 和 Olsen(2000) 则通过对合作社社员的随机抽样调查,计算社员异质性各个层面的变异

程度。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社的社员异质性主要源于不同成员各自的利益诉求差异(邵科等,2008)。不同类型的社员在合作社内部的管理角色和参与目的存在明显差别,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或利益冲突(黄胜忠,2008)。因此,本文利用“合作社的社员类型数量”来表征社员异质性程度,社员类型具体划分为小农、生产大户、运销大户、供销社、农村基层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

本文选取“合作社是否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作为合作社集体产权明晰程度的衡量指标。社员独立账户用以记录社员的出资额、量化到社员的公积金份额以及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在决策机制上,借助合作社对“一股一票”制和“一人一票”制两种表决方式的选择来考察社员对合作社决策的影响途径;在衡量合作社社员的利益分歧时,主要是通过利益分配方式来体现,具体包括按惠顾分配、按资本分配、按惠顾分配与按资本分配二者相结合。

管理角色的多样性决定了领导能力的测度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由于实地调研受访对象多为合作社社长,为避免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过度主观评价,本研究用“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管理者领导能力的替代指标。在考察合作社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时,问卷中设计了问题“若放弃合作社管理者职务,最有可能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和“针对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其年均纯收入与现任管理职务相比如何?”,据此可以判断管理者是否存在外部选择诱惑。

除了上述变量以外,实证模型中还增加了合作社的“社员规模”和“创办时间”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主要是因为,社员规模扩大可能会导致单个社员成功影响决策的概率下降,进而降低其制造影响活动的激励(Appelbaum and Katz,1987),而且,成员规模扩大或创办时间较长,组织还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结构来减少影响活动的发生进而降低影响成本(Milgrom and Roberts,1990)。模型变量的设定和描述具体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设定与描述

名称	定义	
影响成本	社员间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频度	①没有;②有但不多;③比较多;④非常多
	社员试图影响决策结果的频度	①没有;②有但不多;③比较多;④非常多
	处理影响活动的工作时间消耗	①≤10%;②10%~20%;③20%~30%;④>30%
社员异质性	参与主体类型数量	①小农;②生产大户;③运销大户;④供销社; ⑤农村基层组织;⑥农业企业;⑦其他
组织内部结构	是否设立独立账户	①否;②是
	投票表决方式	①“一股一票”为0;②“一人一票”为1
	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	①按惠顾分配或按资本分配为0; ②按惠顾分配和按资本分配相结合为1
管理者因素	管理者受教育程度	①小学;②初中;③高中/中专;④大专以上
	管理者外部选择诱惑	①薪酬≥机会成本为0;②薪酬<机会成本为1
控制变量	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	户
	合作社创办时间	年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05年,山东省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据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底,山东省已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2.6万个,入社(登记)农户26.6万户,总数居全国首位。

为获得定量研究数据,调研人员于2010年1月12-18日在山东省胶东半岛选择了3家苹果专业合作社进行了预调研。选择苹果专业合作社主要源于以下考虑:第一,苹果专业合作社的数量能够保证研究需要;第二,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简化问卷的设计;第三,专注苹果专业合作社,能够消除行业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正式调研于2010年3月29日-4月30日期间进行。调查对象为山东省2009年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目前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苹果专业合作社;调查内容包括:合作社概况、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合约结构及执行等方面的信息。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为合作社社长或理事会其他成员,共获得有效问卷135份。

(二)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Stata10.0软件对所设计的模型进行了估计,计量分析结果见表2。

表 2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β)	标准误	z 值	显著性水平
参与主体类型数量	1.8486	0.1680	11.00	0.000
是否设立独立账户	0.2160	0.2054	1.06	0.293
投票表决方式	0.5046	0.2042	2.47	0.013
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	0.2160	0.2054	1.05	0.293
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	-0.0813	0.1563	-0.52	0.603
管理者外部选择诱惑	0.3992	0.2045	1.95	0.051
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	0.0057	0.0032	1.77	0.077
合作社创办时间	-0.1898	0.1366	-1.39	0.165
LR chi2(8)			239.34	
Prob > chi2(8)			0.0000	
Pseudo - R ²			0.4066	
Log likelihood			-174.6794	

从所估计的结果来看,大多数估计出的系数符号同预期的基本保持一致。根据表 2,可以得到如下几个结论:

1. 模型中 X_1 变量(参与主体类型)系数为 1.8486,说明社员异质性是合作社影响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合作社参与主体的类型数量越多,影响成本就越高。在调查中发现,合作社的参与主体包括小农、运销大户、农村基层组织和生产大户。被调查合作社参与主体类型包含运销大户的有 104 家,占 77.04%;包含农村基层组织的有 70 家,占 51.85%;包含生产大户(≥ 8 亩)的有 48 家,占 35.56%。小农参与合作社的目的在于获得合作社的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生产大户希望通过合作社增强自身市场谈判地位,更有效地抵御市场风险;运销大户希望通过合作社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品牌营销和实现加工增值;农村基层组织则是出于组织目标和继续连任的考虑。由于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不同类型参与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寻求对组织决策的影响。

2. 投票表决方式对影响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调查发现,被调查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的合作社为 56 家,占 41.48%。“一人一票”制,意味着合作社决策未能考虑资本、产品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贡献差异,使得高惠顾额社员有激励通过影响活动谋求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组织决策,进而导致较高的影响成本。

3. 管理者的外部选择诱惑对影响成本有正向显著影响。由于缺乏衡量合作社管理层工作努力程度的外部资本市场,如果管理者选择从事其他职业的确定性等价收入高于合作社给予的薪酬水平,则会导致合作社管理的管理者时间和精力的激励不足,进而导致决策影响活动控制缺失和较高的影响成本。

4. 合作社正式社员规模对影响成本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一方面,合作社规模扩大放大了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另一方面,随着社员规模的扩张,单个社员对组织决策的影响力减弱,成功制造影响活动的难度加大,某种程度上能够遏制影响活动的发生。调查发现:样本合作社的正式社员规模平均为 150 户,其中介于 35~100 户的有 42 家,占 31.11%;介于 101~200 户的有 61 家,占 45.19%;大于 200 户的有 32 家,占 23.7%。合作社规模变化的社员异质性大于组织影响力效应。

5. 合作社是否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对合作成本影响不显著。调查发现,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的合作社为 68 家,占 50.37%。尽管形式上合作社公开承诺为社员设立独立账户,实际上只是作为获得政府资金扶持的条件,在实际运行中并没有实施。普通社员很难掌握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相关信息,更乐于接受平均主义的可分配盈余返还方式,而不是基于真实的惠顾额基础上的返还方式。

6. 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分配原则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合作社“按惠顾分配”或“按资本分配”的单一分配模式,导致“可分配盈余分配原则”对影响成本无显著影响。根据统计结果:按惠顾额分配可分配盈余的合作社有 43 家,占 31.85%;按资本分配可分配盈余的有 30 家,占 22.22%;按惠顾额和资本投入相结合分配可分配盈余的合作社为 62 家,占 45.93%。尽管按惠顾分配和按资本分配相结合的盈余分配方式能够兼顾不同要素的贡献差异,但实际操作中不同要素(如资本和产品)的盈余分配比例的确定十分困难,经常导致更大的意见分歧。

7. 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影响成本的影响不显著。被调查合作社管理者(社长或理事长)的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和“大专及以上”之间,平均处于“高中”水平。由于样本合作社的创办时间相对较短,均值不足 4 年;由于从事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时间不长,处理复杂事件能力和经验积累都还很薄弱,管理者管理经验部分抵消了管理者教育水平的贡献,限制了模型中管理者受教育程度对合作社内部影响成本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影响成本不仅是合作社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源,更是合作社合作原则的一大挑战。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在谋求市场效率的同时,兼顾合作社合作基础上的共同发展目标,降低影响成本是合作社进一步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一大难题。本文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影响成本及其决定因素,计量分析结果验证了以往理论分析的主要观点,即社员异质性是导致影响成本增加的关键性因素;当管理者存在外部选择诱惑、合作社采用“一人一票”制表决方式和合作社规模扩大时,其内部影响成本也将增加;此外,考虑到中国大量小农户的存在,随着合作社社员规模的扩大,社员数量也将成为影响组织内部影响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合作联盟“成员经济参与”原则要求社员为合作社发展提供等额资本金,作为与合作社交易的前提条件。由于我国农户生产规模小、投资能力低,随着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张和业务链不断延伸,通过向部分资源所有者发行无投票权股份能够在吸引各类所需稀缺资源进入合作社的同时,遏制社员异质性程度和影响成本的增加。因此,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发展,新社员加入和社员规模扩大将导致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增强,抑制社员异质性引致的影响成本就成为合作社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由于合作原则导致的产权模糊,合作社内部资源的某些重要属性被滞留在公共决策领域,所有可能的参与者都存在激励花费资源制造影响活动,进而妨碍高效率决策。但是,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高于成本时,明晰产权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尽管合作社可分配盈余的产权明确到单个社员,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公共产权纠纷,但考虑到合作社成立初期公共积累缺乏以及公共积累对合作社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模糊的产权安排不失为面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当然,合作社集体决策程序和规则的调整能够遏制影响活动及影响成本。在实践中,合作社采取“一股一票”制替代“一人一票”制,有助于降低大量小规模社员一致通过不利于少数大规模成员利益决策的可能性。因此,“一股一票”制与民主管理的初衷并不相悖。

管理层薪酬计划可以成为合作社降低内部影响成本的重要工具。与效率工资的工作激励效应相似,适当提高合作社管理者的薪酬水平,可以调动管理者采取措施遏制影响成本的积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社必须向管理者支付高于其外部选择的最高工资水平,因为管理者另谋职业的过程也会产生不必要的时间等待成本。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合作社经营管理者是合作社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管理者的领导能力越强,意味着决策过程中利益平衡能力也越强,能够设计有效的政策方案,控制和减少合作社内部影响活动数量及其成本。因此,合作社管理能力培养和管理者队伍稳定,对于合作社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安慧 2010 《企业并购定价决策机制研究——基于协同效应与影响成本的视角》,《会计之友》第3期。
2. 黄胜忠 2008 《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
3. 林坚、黄胜忠 2007 《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析》,《农业经济问题》第10期。
4. 马彦丽 2007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邵科、黄祖辉、徐旭初 2008 《成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6. 孙鲁威 2010 《合作社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组织力量》,《农民日报》3月19日。
7. 胥胤 2006 《论层级组织的政治性活动成本》,《生产力研究》第2期。
8. Appelbaum E. and E. Katz. 1987. "Seeking Rents by Setting R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 Seeking." *Economics Journal*, 97(9): 685-699.
9. Bogetoft P., and H. B. Olesen. 2003. "The Influence Costs in Heterogeneous Cooperatives: A Formal Model of Sales Distortion."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July 27-30.
10. Cook M. L. 1995. "The Future of U. 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7(10): 1153-1159.
11. Cook M. L. 1994. "The Role of Management Behavior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9(3): 42-58.
12. Gripsrud G., G. H. Lenvik, and N. V. Olsen. 2000. "Influence Activities in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ity." Paper submitted to "The Food Sector in Transition - Nordic Research", June 14-15, Oslo, Norway.
13. Hansmann H. 1996.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 Iliopoulos C., and M. L. Cook. 1999.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in Customer Owned Firms: The Influence Costs Problem."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16-18, Washington, D. C.
15. Iliopoulos C., and G. Hendrikse. 2008. "Influence Costs in Agribusiness Cooperatives: Evidence from Case Studies." Working Paper, Wageningen University, Holland.

16. Iliopoulos C. 2007. "Manager Compensation and Influence Costs in Agribusiness Cooperatives." Available at http://emnet.univie.ac.at/fileadmin/user_upload/conf_EMNet/2007/papers/Iliopoulos.pdf.
17. Milgrom P. R. 1988. "Unemployment Contracts, Influence Costs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s Desig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1): 42 – 60.
18. Milgrom P. R. and J. Roberts. 1990. "Bargaining Cost, Influence Cost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ed. J. E. Alt and K. A. Shepsle 57 – 89.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 Milgrom P. R. and J. Roberts. 1992. *Economics,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20. Mintzberg H. 1971. "Managerial Work: Analysis from Observ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18(2): B – 97 – B – 110.
21. Royer J. S. 1992. "Cooperative Principles and Equity Financing: A Critical Discussio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Co – operation*, 32(2): 79 – 98.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e Costs Determinants in Cooperatives: Evidence from Apple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Shandong Province

Cai Rong and Han Hongyu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Because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arrangement of the cooperatives and non – transferable stock rights of their members, the stakeholders might try to distort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so as to obtain potential benefits whe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concerning benefits/cost sharing are made and communications channels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subordinate run smoothly, thus bringing about influence costs which reduce decision efficiency. Using survey data of Apple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cost and its determin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mber heterogeneity is the key factor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influence costs. In addition, the attractiveness of outsid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managers, "one – person, one – vote" principle and membership scale also result in increased influence cos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coordination of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of members, procedural selection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 making and the design of management incentives will be essential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Key Words: Member Heterogeneity; Cooperatives; Influence Cos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JEL Classification: F324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 105 页)

22. Meng X., and J. Zhang. 2001. "The Two – 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 485 – 504.

An Empirical Study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Urban Labor Market Status: The Case of Beijing

Du Xi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laborer groups with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s(HRs)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 i. e. the laborers with urban local non – agricultural HR, urban agricultural HR, edemic non – agricultural HR and edemic agricultural HR.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with Beijing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 in 2005,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of the four laborer groups with urban local non – agricultural HR, urban agricultural HR, edemic non – agricultural HR and edemic agricultural HR increase in turn, the unemployment rates decrease in sequence and the employment rates rise successively. Further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market status of active labor force. Comparing with the urban local non – agricultural H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agricultural HR, edemic non – agricultural HR and edemic agricultural HR have not spurred the active labor force to be unemployed or be out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market status of active labor force.

Key Words: Labor Market Statu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Unemployment Rate; Employment Rate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61, R23

(责任编辑: 彭爽)